

# 第一章 史学的产生

## 第一节 史学的萌芽

### 一 史·历史·史学

历史是过去的事，它依靠人的记忆、文字的记载和实物的遗存传承后代。人类的历史意识是和人类同时产生的，人的任何一点记忆，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最早的历史传播，是凭记忆的口耳相传，但是人的记忆有限，为了不遗忘过去，先民发明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的办法。这是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历史阶段。我国历史文献中，就有“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sup>①</sup>的记载。刻木记事的最原始形态是以刻痕的深浅，表示事件的大小、轻重，我国云南的卡佤族就是这样<sup>②</sup>。但是时间一长，事情一多，就很难弄清那些大大小小的绳结和深深浅浅的木痕各自表示什么具体内容，至于那些复杂的事物情节和抽象的意思，用结绳和刻木的办法原本就无法记载。这样，人们就开始用绘图记事。起初的绘图，是对实物的描摹，随着人类经验的丰富和思维的发达、提高，图画逐渐被概括、简化，有的只画轮廓，有的只画代表部位。这就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符号。无论是结绳、刻木记事，还是最初的图

① 《周易正义》引郑玄注。

② 参见李家端：《云南几个民族记事和表意的方法》，《文物》1962年第1期。

画文字记事，还都是口耳相传的辅助手段。

文字的诞生，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革命。草创时期的文字，自然不会有共同的规律，后来才约定俗成，诞生了一个个共识的字。我国的汉字是从象形字发展而来的。产生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字是很久以后的事。

由于汉字的这种特点，所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探源，往往便从解剖文字开始。

在原始社会，汉字就已经产生了。但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字。“史”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原形作，《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即是，是右手形；“中”是“正”的意思，即思想端正，不偏不倚。《说文解字》把“中”释为“正”，后世学者多不赞成。清人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中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案卷也。”清人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中说：“史，记事者也，像手执简形。”“中”当作即（册）字的省形，持中就是持册。清末人章炳麟考形、音、义，说像册形，“”是“以笔引书”；“中，本册之类”。近人王国维在《释史》中，认为“中”像盛简或盛策的器具。史学家刘节在《中国史学史稿》中，认为“中”是“中旗”；“中旗”是记载一切史事的，与后世所谓简策的作用是相同的。这是“中”字更原始的意义。上举诸家的解说，大同而小异，都认为“史”字的原意是指掌握文献记载的一种官职。

“历史”一词则是近几十年来才被应用起来的。当着使用这一词汇时，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是指历史的记载。前者是指那些活的历史事实，后者是指那些被史学家认识了或掌握了的历史事实。比较而言，前者丰富多彩，后者则有局限，还可能有偏差。比如：《史记》、《资治通鉴》、《司马

迁传》、《司马光传》、《中国通史纲要》、《世界上古史纲》这些古代和当代人的历史著作，我们也叫它们是“历史”，但是它们只是后人对前代的历史记录，只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并不是那些活的历史本身，《司马迁传》、《司马光传》只是作者对司马迁、司马光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认识，可能正确，也可能有偏差，并且绝对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尽管作者力图做到）。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记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记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sup>①</sup>

“史学”又不同于“史”和“历史”。它是指的一门学问，一门以人类客观的活的历史为对象，利用各种史料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相当古老，如果说最早产生的自然科学是天文学的话，那么最早产生的社会科学就是史学，而且广义地说，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有它的发展史，也有它的史学，所以说史学广及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是无所不包的。

但是“史学”一词的产生，则是比较晚的事情。在中国，直到刘宋的元嘉十五年（438）封建政府设四学（儒、玄、史、文），才标志有了“史学”，稍前也有“史学祭酒”的官职，那只能看作“史学”产生的一个过程。当然，中国古代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史学”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史学”无论就深度、广度来说，还是就科学性来说，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史学”由产生到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有了科学体系后，也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完善。

<sup>①</sup> 《史学要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 1980年印本。

## 二 口叙史事和三代史诗

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产生于商的先公示壬、示癸时期<sup>①</sup>，据今约 3 700 年左右，3 700 年前的史事就是靠一代代脑记口叙传下来的。即使甲骨文记载了相当丰富的社会内容，仍不可能反映丰富多彩的活的客观历史，许多史事仍然靠脑记口叙。所以口叙传播史事形式不仅在文字产生之前，在文字产生以后乃至史籍很完备以后，也还是一种重要形式。司马迁写《史记》就有一些是听来的材料，我们今天搞历史调查、访问耆旧，搜寻口碑，也还重视口叙的史实。只不过今天的口叙形式，已经变成文字材料的一种补充或印证的办法了。

在先秦，口叙史事一直在史事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国语·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国语·楚语上》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在国君周围的这些‘列士’‘史’‘师’‘瞽’‘矇’等所讲的许多内容就是先祖的事。

传说的历史内容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人物被神化，如大禹（治水）、后稷（种五谷）、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都被传说为神或半神式的人物。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二是所传说的人物都是改天换地式的英雄，这些英雄和后来的帝王将相不一样，他们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百姓，而是群众的利益代表者，上述的大禹、后稷、羿、女娲都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这两个特点，也充分

<sup>①</sup>见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1 期。

反映了先民的历史观点。以今天的认识水平，不会相信那些神乎其神的事。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所以重视这些神话，在于透过神话，窥探远古的社会内容。

当文字记载发展到比较成熟，书写工具比较方便的时候，口叙史事便被记载下来，有些则一直保存到今天。如：《庄子·盗跖》、《礼记·礼运》、《韩非子·五蠹》等所记先民居处情况和从茹毛饮血到取火为用的传说；《周易》对先民生产生活的传说；《吕氏春秋》、《商君书》追记早期社会制度问题的传说；《世本》中所记的发明创造的传说；《左传》、《国语》、诸子之书保存的改造自然、保护部族的英雄传说；等等。司马迁就是依据这些传说写出了《史记》开篇《五帝本纪》。

夏、商、周三代，还以神话故事、历史传说为主要内容编成史诗，传诵这些史诗的人，往往是瞽矇一类乐官。左丘明就是一个失明的人，做鲁国的史官。以失明之人传诵历史故事，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也有相同的情况，如希腊的荷马，也是一位失明者。以诗的形式传诵历史故事，容易记忆，便于普及，所以，传诵久远。当然，起初的史诗是很粗糙的，经长期的流传，不断加工完善，所以这些史诗都是众人的作品，并非少数乐官的创造。

在先秦，史诗繁多，孔子删《诗》时，尚可见到 3 000 余首。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诗主要保存在《诗经》中，共有 305 篇，分“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是民歌，由政府派“行人”从民间采集而来，经过加工润色而成，以反映现实为主，但今天看来，也未尝不可称为“史诗”，比如：《豳风·七月》反映一年四季农业生产劳动，对我们认识西周社会，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雅”、“颂”，在当时就是史诗，多为追忆祖先，歌功颂德之作。比如《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说明商族是由以鸟为图腾的原始氏族发展而来的。《大雅·生民》说：“厥初生

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是推尊周的祖先后稷之诗。后稷之母姜嫄踩了高辛氏之足印而生后稷,把后稷神化了。文王、武王的先祖即能非同常人,当然他们自己也就非同寻常了。非常之人才能做非常之事。这反映了先民们的思想认识特点。“雅”、“颂”还有些篇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习尚、筑城、立庙、封邦、建国的基本过程。

“史诗”的形式,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除了屈原的《天问》外,再见不到什么重要作品了。这可能与战国以后,多种形式的史著(如编年体《左传》、国别体《国语》、谱牒体《世本》等)发展有关系,“史诗”形式只好退避三舍了。

“史诗”作为史料来说,它与历史传说一起反映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对当时简略而缺乏关联的史官记录,起着联络会通、委曲细节的作用。对于后来发展起来的某些史体也有创始之意。如:歌颂英雄人物的篇章,上继传说遗风,下开历史传记的端绪;专咏一事的篇章,具有纪事本末的性质;歌颂先王伟业的篇章,又可以看作历史论、赞的远祖。

### 三 史官·档案·编年记

史官的产生大约与“史”字同时。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说:“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继以被载笔之编,于是史官、史籍生焉。”

我国最早的史官,是见于文献记载的黄帝时的仓颉、沮诵。相传,仓颉、沮诵是汉字的创造者,这在诸子之书,如:《荀子·解蔽》、《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君守》以及《世本·作篇》均有记载。事实上,汉字的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具有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的事业,如果说仓颉、沮诵创造汉字,至多只能说他们在先民创造的基础上做了规范化的工作而已。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才说:“黄帝之史仓颉”,可见,

承认仓颉是史官，是后来的事。不过，这一情况恰恰说明了“史”字与史官的产生同时。

如前文所述，今天看到最早的“史”字是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除“史”字外，还有“作册”“尹”等字。《尚书·多士》还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册”是简的编排，“典”是放到架上的“册”，尊贵的文献。这说明继黄帝时代之后，殷代也有史官。在金文里，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据王国维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所以有“作册尹”“内史尹”的职称<sup>①</sup>。

就史官之名氏来考察，黄帝时，除仓颉、沮诵外，还有大挠、隶首、容成、史皇等等（见《世本》宋衷注），舜时有伯夷（见《大戴礼记》），夏初有孔甲（见《史通·史官建置》），夏末有终古（见《吕氏春秋·先识》），殷时有迟任（见《尚书·盘庚》郑玄注），殷末有向挚（见《吕氏春秋·先识》）、尹逸（见《史通·史官建置》）、辛甲（见《左传》襄公四年）。到周代，见于文献的史官名氏，可能已接近 30 名，如：史佚、史豹、史籀、史伯、老聃等。

据《后汉书·班彪传》载：“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这些史官与政府官吏是互相结合的。他们的职责除了记事外，还“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sup>②</sup>。在殷代，从事占卜的“贞人”也是史官。所以，史官的职责兼有多方面，地位尊贵显要，甚至可监督、左右国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繁富，国家机构也在增加、完善。于是史官也逐渐有了明细分工。据《周礼》载，周王那里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五史有明确分工。“太史掌

①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卷六。

②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所谓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八枋：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之家宰”。五史是协助冢宰工作的。此外，还有女史，是负责后宫记录的。这些史官在同一时间不一定全备，《周礼》所记，可能是对商周以来所设史官的归纳和概括。

此外，《礼记·玉藻》和《汉书·艺文志》还有左、右史的名称。不过，职责正好相反。前书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后书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史、右史是否官名，学术界看法不一致。我们赞成非官名的见解。两书所记正好相反，恰恰说明左、右史是不固定的，而《大戴礼·盛德》还说“内史居左，太史居右”，至于记言、记事本来就难以截然分开。所以，左、右史可能是五种史官上朝居于国君左、右的称呼。

在文化被少数人掌握的古代，史官的职业是世袭的。据《史墙盘》和同组铜器铭文所载，微氏家族就是世代的史官。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先祖在周做太史，到周宣王时，才“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种例子在先秦文献里还可举出多处。

在周朝，不仅周王那里有分工较为完备的一套史官，诸侯亦有史官。有的诸侯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伯禽在周初受封于鲁，周王就给带去了“祝、宗、卜、史”<sup>①</sup>，这些史官当然也是世袭的。

国家机构中史官的设置，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连续不断的史料。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再加以整理编纂，便是最早的档案汇编。由于这些档案多是按时间排列的，所以也就产生了最早的编

①《左传》定公四年。



年记。

商周的甲骨卜辞和金属器物上的铭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这些最早的档案的内容，毫无例外都是国王和贵族的活动。

甲骨文的作者没有历史意识，却是历史记载的萌芽，就是说已经注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活动）四个记事要素了。如：“壬子卜，贞王田于旂，往来亡灾。兹御。获鹿十二。”<sup>①</sup>后来发展起来的记事，也还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事件）这四个要素。不过，甲骨文对时间的记载，往往并不完全清楚，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年月，有的开头记日，末尾记月、年，事件也缺乏关联。这反映了编年记的原始形式。

金文也比较重视时间的记载，年月日完全的要比甲骨文多，只是写法与甲骨文有些不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隹九月，王在宗周令孟”，而在结尾写“隹王廿又三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又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后来流行的编年体史书，都是《颂鼎》这种写法，直到今天我们的编年记事，也是先年、次月、再次日。这与有些国家和民族先日、次月、后年之序不同。

从字数上来看，甲骨片上的字不多，少者几个字，多者一百几十个字，金文则字数在百字上下的已不在少数，最多者达近 500 字，《毛公鼎铭》就有 497 个字。

金文和甲骨文比较，金文有了明确的历史意识，表现在铭刻结尾常常见“其子子孙孙永宝用”等语。由甲骨文的无历史意识到金文的有历史意识，这是记事上一种质的飞跃。

我国现存最早的档案汇编就是《尚书》，据说孔子之时《书》有 3 000 余篇，经孔子删定而为百篇，秦火后，传出的篇数更少了。

① 见《殷虚书契》前编。

《今文尚书》由秦博士伏胜在汉初传出，只有 28 篇，《古文尚书》是孔壁所出，但因未立于学官而失传，今天所见到的《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賾伪造的，虽然内容也有史料价值，但已非原貌，不足为凭。

《尚书》以记言为主，但不只是记言，有些篇章就是记事的，如《金縢》、《顾命》。前者围绕金縢藏书、启书的情节，叙述周公的忠贞、遭谗，以我终于得到谅解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后者从成王病重写起，经遗命，迎奉康王，康王与群臣在朝堂相见及康王之诰，写得极清楚。即使是记言的众多篇，开端也往往有一小段记事，在《召诰》的开端，记事还比较详细。

后人依据《尚书》各篇，进行归类，分成典、谟、训、诰、誓、命六体，其实并不能包括全部《尚书》。《洪范》、《禹贡》两篇就不属六体的任何一体。所以，我们不认为《尚书》各篇的作者是遵循什么凡例或史学思想写作，而是“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sup>①</sup>。《尚书》更无明确的时间观念，各篇也无内在联系。所以，尽管《尚书》各篇记事较甲骨金文进步，但仍不算是史学著作，只是档案汇编而已。

最古老的史学著作，应是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史官对档案文书按时间排列整理的编年国史。这类史书，在春秋时相当多，墨子说他见到过“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史事之盛。名称也五花八门，晋国叫《乘》，楚国叫《梲杙》，周、鲁、齐、宋、燕等国都叫《春秋》。但是，这些史书都未流传下来，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可能是晋国史书，但已是残篇断简，所以这些国史是什么样，很不清楚。不过《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sup>②</sup>，可以揣知，其内容主要是诸侯争霸事。中国古代史书善写战争，看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孟子·离娄下》。

来是有源远流长的原因的。

春秋时，国史之外，还有世卿的家史。这些家史和后来的家史不同，它们也是官史，而不是私家所修的家史。《国语·晋语》韦昭注，记有史墨（史黯），就是赵简子的史官。《韩诗外传》卷七还载：“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这些负责家史的史臣也同天子、诸侯那里的史臣一样承担直书世卿之家的事。这些家史也没有一部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后来《左传》上所记郑世卿子产、齐世卿晏婴、晋世卿叔向的言行上窥探一些蛛丝马迹。

## 第二节 中国第一部史学著作——《春秋》

### 一 《春秋》诞生的历史条件

《春秋》是春秋末期由孔子依据鲁国国史——《鲁春秋》，兼采列国史料，以鲁国 12 位君主（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系为序，整理编纂而成，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学著作。

《春秋》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商周以来不断积累的各种档案、编年记为《春秋》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甲骨卜辞的发现和使用虽是近代的事，周朝青铜器物、石刻、简策却大量传世。周王室和各国累记有年的编年记，许多保留到战国时期，曾为战国诸子所用，春秋末年当大多存世。民间还有传说、史诗等口头资料广为流传。春秋中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的科目，曾列举“春秋”、“世”、

“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种文献<sup>①</sup>。时人常举的还有“易”“箴”“时”“书”等，总计数十种，说明这一时期积累资料名目繁多、内容丰富，为历史著作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材料。

(2) 历代史官逐渐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为《春秋》的产生提供了技术上的借鉴。商周以来职务世袭的史官在实践中逐渐将历史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始末等要素完善起来，而在系时、记事的方法，弃取选择记述内容的原则等方面也逐渐形成一定之规。譬如系时问题，在甲骨卜辞上已看得十分清楚，但规范的系时形式则有一个发展过程。商与周初以干支纪日，放置文首，叙年月于文后，如：“戊寅卜，……在十三月。”<sup>②</sup>“癸未王卜贞……在四月隹王二祀。”<sup>③</sup>西周记时皆统一于王，金文一般将年月日放置文首，如：《散季敦铭》：“唯王四年八月丁亥……”，《卫盂》：“隹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尚书》记时与金文近似。记时形式越来越细密完整的发展，为记时严格的编年体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 时代变化使官府垄断学术的局面被打破，私人治史成为可能。春秋末期进入激烈的历史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史官职位极不稳定，不少人流落到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不少国家丧邦绝祀，史官们携抱载籍流亡他国。这些失去了昔日社会地位的人，开始著书立说、开馆设学、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文献典籍谋求生存。于是，传统的“学在官府”制度瓦解，只有专职史官方得记载和保存历史文献的局面结束。这种变化给史学带来深刻影响：一方面，官方文献因而扩散流传，为私门学者提供了

① 《国语·楚语上》。

② 《殷契粹编》 930。

③ 《甲骨文合集》 37836。

便利；另一方面，一批私家学者或出于使命感，或出于学派理论需要，竞相搜集文献，由此产生了私人著作。

## 二 孔子生平及其与《春秋》的关系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其先世为商族之后，周初封为宋，曾祖孔防叔逃难到鲁国，为孔氏，父叔梁纥为陬邑宰，早卒。孔子幼孤贫，及长，为“委吏”（掌仓库）、“乘田”（掌牛羊畜牧），均为小吏。中年时代遇鲁国内乱，至齐国做了高昭子家臣。后回鲁国整理古籍，聚徒讲学，创儒家学派。50 岁左右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宰，后升任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 500），随定公赴夹谷之会，为鲁国君相，折服齐景公。孔子对季氏为首的私家势力的强大忧心忡忡，极力想削弱它，因而遭到新兴势力的反对而去职，从此便周游齐、卫、宋、郑、陈、蔡、楚等国，宣传儒家观点，但不被接纳。游历 14 年之后，重返鲁国，致力于整理和传播古籍的文化教育事业。死后，他的弟子门生将其一生的言论汇编为《论语》一书。

孔子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伟人。他在史学上作出了三项重要贡献：其一，他是全世界最早的历史文献学家，《诗》《书》经他整理而成，《易》也有他的解说，《礼》《乐》被他重新审定。其二，最早从事历史普及工作，他自称“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sup>①</sup>。他把历史作为教学的主要科目。其三，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学著作——《春秋》。

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是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然的社会现象。生活于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孔子对此看不惯，为了改变现状，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把目光投向他所熟悉敬奉的“周礼”，即企图恢复周初那种社会秩序。因此他处处碰壁，找不到实

<sup>①</sup> 《论语·述而》。

现自己政治抱负的舞台，于是退而著《春秋》以明志。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以《鲁春秋》为据，参考他所能看到的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各种史料，按照“据鲁、亲周、故殷”<sup>①</sup>的原则，删繁就简而写成。以《春秋》校鲁编年记佚文，可以看到，有些袭用旧文，有些参照他书而有所修改，有些删繁就简，有些则遗弃。为了用写史的方法贯彻他的思想主张，他采用了“春秋笔法”以定褒贬，这也是《春秋》与鲁国国史不一样的地方。

### 三《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其编写方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sup>②</sup>。这种编写方法是对古老编年记写法的继承，又为日后一些史书所袭用。不过，因为对每一事写得过分简约，少者，一事只一字，多者，一事亦不过 47 字，所以使人不易了解，甚至产生误会，所以说《春秋》只能算编年史的雏形，尚需日后发展和完善（或说《春秋》只是孔子讲史的提纲）。

《春秋》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一部带有鲜明政治目的写作的史书。表现在孔子用“春秋笔法”来贯穿他的思想主张，讲究“属辞比事”，字里行间渗透它的“微言大义”。这种写史方法也影响到后来的史学家，欧阳修写《新五代史》时也用了“春秋笔法”。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由私人独力编撰而成的史书，开我国私人修史的先例。在以前，“学在官府”，私人无权修史。孔子时代，社会发展，学术下移，文献也传播到民间，正是这种客观条件和孔子主观条件的具备，才诞生了《春秋》。此后私家修史便逐

① 《史记·孔子世家》。

②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渐发展起来。

《春秋》记 242 年史事，重点放在当代，略古而详今。重视近、现代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司马迁《史记》详秦汉，班固《汉书》修前代史，以及后来形成的修前代史的制度，都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主要是一部政治史，但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科学内容，尤其为古代天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在鲁国记载的 37 次日蚀中，就有 36 次是准确无误的。对于彗星的记载，也是准确的。以后，我国历代“正史”都重视天文现象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现象的记载，可说是《春秋》这一传统的继承。

### 第三节 战国时期史学领域的拓宽

#### 一 战国时期文化的特点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思想家辈出，而且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药、艺术等方面均有大量新的成就出现，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一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战国文化产生于战国时的社会大变革。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对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促成了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确立和封建集权政治的形成。封建制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战国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战国文化的发展是从学术下移、文化普及开始的。在春秋及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学在官府”是经久不移

的传统。春秋末年，孔子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开创了私人著述、讲学的风气，培养了一批人才，从此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到了战国，私人著述、讲学之风大盛，受教育的人空前增多，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知识分子。“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文化普及、学术下移不仅是战国文化发展的直接前提，而且也是战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战国时期的“士”是创造战国文化的主体。由于出身不同的阶级、阶层，加之个人生活环境及经历的不同，他们观点各异，互相诘难，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派别，史称“百家”。当然，这里的“家”不像今天划分学派那样有严格的标准，大抵是指持有独立见解的个人或若干人。所谓“百家”只是概指，据《汉书·艺文志》统计，有 103 家之多，其中主要的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 10 家，影响最大的当属儒、墨两家。如此众多的文化派别展开争鸣，自然使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 二 完备的编年史书《左传》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班固撰《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有几种不同说法：（1）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鲁国的君子、盲人左丘明著有《左氏春秋》，其他事迹不详。（2）东汉班固认为《左传》的作者是《论语》中提到的那个孔子敬重的左丘明，并说他与孔子同观鲁史记，孔子作《春秋》，他为之作传。据此，班固把左丘明肯定为春秋末年人。（3）宋代学者郑樵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氏，并非左丘明，而左氏是战国时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4）清代学者姚鼐认为《左传》是战国初年的吴起所作；（5）清末刘逢禄、康有为



为《左传》是西汉刘歆采摭《国语》，依《春秋》纪年而精心伪造的作品。

《左传》究竟作自何人，成于何世，成为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现代学者根据《左传》的记事断限、预言应验情况及流传情况等推断，认为是孔子门徒或七十子后学根据左丘明的口诵并加以补充在战国初年写定的，依据古代重视传授系统的习惯，仍推左丘明为其作者。这个意见被较为广泛地接受。

《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但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事实上，《公》、《谷》二传是解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而《左传》并不解释《春秋》经义。《左传》的流传，在战国中后期已经开始。西汉时，《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立于学官，《左传》只在民间流传。西汉末年，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并竭力争取使之立于学官。当时的一大批学者坚决予以抵制，理由便是它不传《春秋》。由此可见，《左传》在当时仍是别本单行，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以经文和传文合在一起不同。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开始以传附经，合为一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形式。即使从今本来看，也有很多无经之传、或有经无传和经文、传文相矛盾之处。从取材来看，孔子《春秋》是删节《鲁春秋》而成，而《左传》则博采了古代和当时的史书记载，如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以及周、郑、宋、卫等国的旧文简册及流传在口头上的历史传说。因此，《左传》是一部按鲁君十二公的次序，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春秋历史的著作。

从历史编撰来看，《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如同大事记，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左传》在叙述历史活动时有概述，有直述，对于主要历史事件必叙述其前因后果，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在记述事件的同时，书中又重视记述人物的言行，能够反映出社会